

顧問

盛成

劉蕙孫

嚴微青

編撰

方寶川

太谷學派遺書

- 中國儒家最後一脈學派
- 口耳相傳的神秘學派
- 全集第一手資料
- 首次全部面世

方寶川編

太谷學派遺書

第三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太谷學派遺書·第三輯 / (清) 劉大紳 等著；方寶川編.影印本。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11

ISBN 7-80643-647-2

I.太… II.①劉… ②方… III.古典哲學 - 中國 - 清代 IV.B249.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88332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編輯策劃：廣陵書社

定 價	680.00 圓	印 刷	經 銷	出版發行	編書名 著者	太谷學派遺書 劉大紳等著	方寶川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55 號) <small>(江蘇揚州市鳳凰橋街 24-6)</small>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開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92.3125 印張

序

劉蕙孫

太谷學派是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安徽池州石埭人周太谷所創立。太谷名穀，字星垣，號太谷，又號空同子。太谷學派初無其名，太谷和其門弟子最初都自稱為「聖功弟子」。「聖功」之意，出自於《周易·蒙卦》：「蒙以養正，聖功也。」意思是說，宇宙與人都是秉賦自然界的生機而產生、發展和作用的。一般的人則是隨此生機而生而沒而轉化。能够養得其正者，則可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共明」，這就是所謂「聖功」。「聖功」也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明德」，《論語·顏淵》中「視聽言動」之「視聽」作用。視聽的作用在於認識客觀存在，所謂「視思明，聽思聰」。但所謂「耳目聰明」，并不是一般所說的眼睛亮，耳朵尖，而是《周易·繫辭》所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換句話說，就是「視聽」本能的感應作用。經過這樣「視聽」的本能，以「言動」支配客觀一切，使它盡美盡善，即《大學》所謂：「在止於至善」。《莊子·天下篇》稱前者，即「視聽」的認識作用為「內聖」，後者命令支配的成果為「外王」，此就

是「內聖」與「外王」之學。而「內聖」和「外王」又是相互作用的，這種相互作用是通過養正而取得。千古儒家的學問根本就在於此。由於後世儒者不理解「內聖」、「外王」的相互作用，而把「內聖」、「外王」分成兩截，專以人知用事，「內聖」之功遂不存於人世。只有《大學》所說「致知在格物」、「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進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纔是儒家學說一貫之道理。因其關鍵在於修身，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太谷之學是他早年奔走四方尋求安身立命之道後，借鑒佛道，得到儒家「內聖」、「外王」的一貫真理，纔提出的「聖功」學說，以做一個「聖功」弟子，來作為自己及門人的奮鬥目標。由於周代以後，一般人不懂儒學的根本，以為從「致知格物」達到「治國平天下」的這種「內聖」、「外王」的一貫關係，就是為了維持封建統治所制定的一套人與人關係的制度。到了明朝晚期，更有人認為程朱理學也是迂腐的，「口言仁義道德，心存高官厚祿」就是儒家。太谷「聖功」之學則強調身心性命，許多人說他是受了佛、道的影響，合三教為一，甚至以為是受到福建莆田林兆恩三教和江蘇松遼陳智的「三教一家」之說的影響。其實太谷在《周氏遺書》中是絕口不談佛、道，書中所謂「二氏」是指《論語》中所說的老、彭。太谷弟子張石琴，為了講學方便、世俗易懂，纔談到了佛、道。但在其《與秦雲樵書》中，對佛、道之學的態度已說得很清楚了，「聖功之學」實非三教

合一。又因爲找不出學派的淵源，人們就任意爲之命名，如「泰州教」、「太谷教」、「大學教」、「空同教」、「黃崖教」等等，全是旁人所虛構。太谷學派之名是出自一九二七年盧冀野先生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的《太谷學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一文，盧氏是鍾泰的學生，鍾泰（字鍾山）又是黃葆年的門下，對於太谷學派有一定的瞭解。學術界認爲這個名字較爲妥當，遂固定沿用了下來。

太谷學派的實際淵源，其再傳弟子謝逢源在所編《龍川夫子年譜》中說：「包義天子也，文王諸侯也，周公卿大夫也，孔子陪臣也，太谷庶人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意思是說，太谷之學與一般的小儒思想是大不相同的，是和義、文、周、孔一致的。但學派中的其他一般門人，對謝逢源的話却理解不透，說太谷是直承義、文、周、孔而來，太谷學派的道統應是「義、文、周、孔、周」。這實際上是一種誤會。周太谷在《周氏遺書·進學解》中自說：「學者果能循朱、張、程、程、周、孟、思、曾之緒，而後尋孔、顏之樂，復興幾存義之德，庶不負斯進學之解云。」又在同篇中特別寫了一個《道州節》，「道州」指的是濂溪周敦頤，從而更明白地說明了太谷之學實際是淵源於宋學。「義、文、周、孔、周」中的最後一個「周」，實際是指周敦頤。過去沒有見到學派的遺書，范文瀾先生在延安本的《中國通史簡編》中稱：太谷學派是「王學」（陽明的左派）。我也如是誤解。後來范老見到資料後，就把這種說法去掉了。現我也在此糾

正這一錯誤。

關於學派的遺書，本來儒家講學是口口相傳，專述前王之道，所以孔子說是「述而不作」。太谷逝世前，遺囑門弟子說：「文章在笥，予之傳其在是矣！」汪全泰遂將其全部文章帶回加以整理。後來張石琴在山東黃崖講學，汪又全部將此轉交張石琴。因為其主要內容都是解答其及門弟子所問的「九經」、「四子」中有關「內聖」方面的文章，張石琴就將此編為《十三經或問》，後又以其他的文章附之於後，合稱為《周氏遺書》。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山東巡視閻敬銘的部下因貪功而污蔑張石琴為教匪，發兵圍剿。石琴及門弟子不屈，舉山自焚而死，死者多達兩千多人，所藏遺書因此也付之一炬。按：太谷弟子中最早有陳一泉，原是一佛家；另有韓仰瑜，本是一道家。當初太谷則是他們的門下。太谷悟道後，陳、韓反拜太谷為師。道光初年，太谷到揚州講學，又有進士出身的汪全泰拜在門下。太谷曾給汪全泰寫過一封信，云：「爾孝爾慈爾尊師爾仁民，予門微陳、韓，皆不及爾矣。」到了晚年，又得到儀徵人李光炘、張石琴，共為五大弟子。黃崖事後，汪全泰避禍，在京作部郎，絕口不談學派之事，他的文集中也隻字不提。假如沒有太谷學派遺書的資料，人們就不可能知道他與太谷學派的關係。

黃崖事後，除去陳、韓二人終於方外，太谷學派的主要傳人是李光炘（龍川）。由於黃崖事件在當時是被定為叛逆，學派的活動遂轉入地下。不久，李龍川得到了曾國藩的諒

解，又開始較公開地在大江南北講學。我的祖父鐵雲先生劉鶚是李龍川的門下。清光緒庚子後，黃崖案得到昭雪。此時李龍川等人均已作古，過去的事件也漸為歷史所沖淡。一九〇二年，鐵雲先生和同門毛慶蕃、程恩培、楊士敏等就合議在蘇州葑門內十全街建立一個學舍，請原在山東作縣官的黃葆年和在江北小規模講學的蔣文田作為學舍的主講，黃正蔣副。又因為蔣在江北講學是為了繼承黃崖張石琴的道統，故稱之為北宗，黃葆年則為南宗，是為南北合宗。由於此時星散在四面八方的龍川弟子又漸漸回到蘇州，取「牧馬歸群」之意，命其學舍為「歸群草堂」。鐵雲先生是歸群草堂的骨幹，我的姑母也嫁給黃葆年次子黃壽彭，我的父親貞觀先生劉大紳拜從黃葆年門下，我的繼祖母也是黃的門人，我們一家與太谷學派的關係可以說是很深的。我在小時候，只見過一本《龍川詩鈔》，稍大點又聽說《周氏遺書》共抄了十二部，分給黃、蔣、楊、劉等門人，但我們從未見過，也未聽說過還有其它的遺書。歸群草堂的黃、蔣兩先生逝世後，一九二五年首座李平孫先生繼位，不到一年李也作古，歸群草堂遂失去了合法的繼承人。我的姑丈黃仲素（壽彭）請蔣文田夫人以師母身份令他主講。此時，歸群草堂的經濟支持者劉、毛、楊、程諸家的老輩都先後作古了，因此草堂日漸不景氣。本來有些門下經常由草堂給予相當的生活津貼，此時也辦不到了。我的繼祖母鄭氏老太太，本來是草堂女生的學長，一九三六年到天津我家就養。她把鐵雲先生珍藏的一部《周氏遺書》也帶到天津，我父親與我們這纔第一次看到

太谷學派的主要著作。我們覺得學派思想與平時傳聞是完全不同的。我父親本是學西洋哲學的，後也研究陽明心學與佛學，名義上雖是黃葆年門下，但實際上接觸并不多，因有了《周氏遺書》，纔深入研究。我們在天津家的鄰居中有一位著名的中醫潘孝侯（葆真）先生，是我父親的表兄，也是黃葆年的門下，但他當時手中連《龍川詩鈔》也没有，向歸群草堂要，也說沒有。我父親就和他商量，現在同門中許多人要這本書而得不到，我二人不妨合印此書，贈送給大家。於是就印了三百本，內容除去詩以外，還把《李氏遺書》及我祖父在世時石印的李龍川《素隱術》及幾首原詩集未收的詩一并刊印發行。印成後先是寄奉幾十本給歸群草堂，請代贈同門。一人以為這是好事，意想不到黃葆年嫡傳弟子一代中以黃仲素為首，聯名來了封信，譴責我父親和潘孝侯先生，說這是泄漏天機，罪無可赦。并指出挽救的辦法只有將《李氏遺書》那部分拆下來，燒成灰，用黃綢子包了，雇一小船送到揚州江心，在人間不留片紙隻字。《龍川詩鈔》則要全部重新裝訂，送到揚州的龍川草堂保存，不准私自送人。門弟子中想請《龍川詩鈔》的，可以寫信給歸群草堂，經全體討論決定後，再贈送一本。我父親與潘先生看了來信後，不大理解。潘先生主張不予理睬，我父親則主張與他們辯論。遂由我父親執筆，寫了一封好幾千字的長信，辯論說：在當初《遺書》不敢示人是因為有黃崖教案的關係，現事隔數十年，黃崖教案已呈請昭雪了，歸群草堂也創立三十餘年，為何還要保密？孔孟之書、佛道經典，為何也可公開刊行，而不

保密云云。蘇州的一些門弟子見信後，認為此信說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同時也沒有力量控制，遂不了了之。但意料不到，在來信具名人中有一位叫張令貽（名德廣）的，見到此信後，又單獨來信與我父親說：歸群草堂舊藏的有些遺書本來很零亂，他個人投資，經黃葆年同意已整理抄清，共得八十餘種。歸群草堂中一些家境貧寒的門人就以抄寫費資助。因他個人經濟實力不够，還曾回家變賣田產來辦此事，所以蘇州人稱他為「張三瘋子」。又說：我父親與潘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因而也就把他自己所編抄的遺書書目寄贈一份。張令貽是程恩培的內侄，和我家還是親戚。由此，我們纔知道原來太谷學派還有這麼多的遺書。幾年後，我們搬家北京，遇到一位汪中方先生，也是黃葆年門下。得知此事後，他就登門來要《詩鈔》，亦認為蘇州那些同門思想太保守了。並說：先生（黃葆年）當時也並非不給人看遺書，門弟子要求讀的書，還是時常指定讓人抄。他自己就已抄存《張氏遺書》、《觀海山房追隨錄》、《十三經或問序》和《濂溪一滴》等幾種。後又將他所抄者借給我們傳抄，我們這纔又見到了《周氏遺書》和《龍川詩鈔》以外的學派遺書。

抗日戰爭時，蘇州淪陷，我姑母已死，姑丈黃仲素等人就去江北泰州避兵。但歸群草堂的房子依然保留。抗戰勝利後，姑丈回到蘇州，不久與張令貽等先生先後作古。而張先生所編的《歸群寶籍》均歸草堂所有。解放初期，我父親歸養蘇州，還陸續從草堂中借抄了部分遺書。但好景不長，草堂房東賣房拆遷，所存遺書由我表兄黃花農（玉琪）全部收

藏，再不許家人外借了。《南京理工大學學報》（哲社版）一九九三年第四期發表的孫慶飛《太谷墓與太谷學派活動》一文披露：據李興甫口述，一九五一年寒假左右，「蘇州一詹姓門人，將手抄本《太谷遺書》外傳，李興甫等人雇船於蘇州河上，逼詹姓人交出全部藏書，於河面上焚毀。」

因為太谷學派的組織活動和思想內容，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上是個空白與斷層，學術界對其十分關注。尤其是范文瀾先生，得知劉鶚是太谷學派的骨幹，就一再向我瞭解有關學派的內容及有否遺書行世。解放之初，我聽說有些遺書交歸蘇州圖書館，就立即寫信向范老匯報，建議將全部遺書收歸國有，組織力量研究。范老親筆回信說：這樣做是應該的，只因建國之初，百業待興，國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得待來日再說。又要求密切注意情況並及時聯繫。我如命將原信收藏，可惜文革期間亦被破「四舊」給抄走了。一九八八年，江蘇淮安成立劉鶚故居，召開「劉鶚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暨《老殘游記》學術討論會」，我們應邀出席。當時出席大會的人一致認為：要研究劉鶚思想，一定先要研究太谷學派。泰州宣傳部門的領導在會上稱：在文革破「四舊」時，太谷學派門人手中的遺書大都散了出來。後以泰州圖書館為主，訪求搜集了四十餘種。時又有一些人不贊成公開流通，但有一老人蕭齊先生，其父為黃葆年的門下，則極力主張流通，并組織了一些老人家，在泰州東門新華書店古籍組，代人抄寫。只要有人訂購，就予代抄。福建師大圖書館

方寶川同志遂與之聯繫，訂購了一套凡三集二十六種五十三冊。一九九一年十月，我與方寶川同志及德國漢學家屈漢斯博士一起到蘇州、揚州、儀徵、泰州等地考察太谷學派遺迹。在泰州市政協副主席楊本義先生的安排下，我們到了泰州圖書館，看到了該館珍藏的所有學派遺書。得知泰圖所藏，大都是傳抄本。至此，我所見到的原抄本，一是鐵雲先生舊藏的《周氏遺書》，文革間怕遺失，贈送給了浙江省圖書館。二是抗戰期間，在北京琉璃廠發現過一部裝璜版式與我家完全一樣的一部《周氏遺書》，據說也是所謂十二部之一。三是現存我家謝逢源稿本《龍川弟子記》。四是現藏泰圖的李龍川硃批《孟子》七篇。這些藏本，均彌足珍貴。由上可見，保存、流通或禁錮、消滅學派遺書，在思想上有門爭的。為什麼會如此？至少可以說是認識的不同。

一九九五年，方寶川同志提出了編輯出版《太谷學派遺書》的計劃，很快就得到了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王明發主任的大力支持，并呈請、得到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資助。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王主任親臨福州，與我及寶川同志共同磋商研究，我表示了我無條件提供所藏資料，由方寶川同志具體負責編撰工作，初步決定分三輯印行。其內容：第一輯為周太谷等學派各代主要傳人的遺書、語錄及有關書目資料；第二輯為學派門人詩文集；第三輯為學派門人對儒家經典及佛、道典籍的批注、學術專著及其他編著。

在保存、流通和研究學派遺書的過程中作出較大貢獻的，首先應該提出的是張令貽先

生輯抄《歸群寶籍》；其次は文革以後，泰州市有關部門訪求搜集，特別是蕭齊老先生主持傳抄；其三是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的王明發主任和方寶川同志奔走組織，共同完成了《太谷學派遺書》的編印任務。寶川同志曾問學於我，研究太谷學派多年，治學嚴謹，尤擅考據，頗多成績。曾作爲訪問學者赴德國慕尼黑大學與屈漢斯博士合作研究太谷學派的有關課題。此次他提出計劃，要我作顧問，爲之撰寫序言，并代懇盛成和嚴薇青兩教授，允允爲顧問。因爲我的家庭與學派的關係，刊印遺書更是我數十年來的心願，於是我就當仁不讓，將我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略述如上。可以說，該書的編撰出版，填補了太谷學派研究史上文獻無徵的空白，對學術界進一步全面研究太谷學派的活動及其主要思想，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至於我個人對太谷學派思想不成熟的認識，今亦借此機會簡述如下：

一、學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民間的暗流。千古以來，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太谷學派認識到了這一點，認爲地主土地所有制是農民最大的痛苦，力主土地歸國家所有。不但這麼主張，而且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照此進行。如周太谷本人就是一個大地主，認識這一點之後，除留了點糊口養家的田地之外，全部分給了無地和少地的親友、佃戶。

二、學派認爲人類最大的苦惱是生命短暫，所有的英雄豪傑均不能免。各種的宗教，

皆以解決生死大事為基本要求。太谷學派也講求「祈天永命」。但其「祈天永命」的原理與方法不同於各種宗教只寄託於神力的作用，而是以尋找和掌握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為主要途徑，所以並不出家或入山修行以求解脫。講究在現實生活中通過「立言、立功、立德」，以達到「希賢、希聖、希天」，即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人的追求就是安身立命。土地問題解決了，身就安了；生死大事解決了，命也就立了。

三、學派是以認自然為主。自然是客觀存在的，祭祀是對自然界的報德，揭示並非神力。但有神論已年深代遠，不可能截然否定，因而強調了「祭神如神在」的理論。而所祭之神，只是天地、日月、山川等自然神。因此，實際上太谷學派是無神論者。

四、學派認為儒家所謂的「仁、義、禮、智、忠、孝」等等，既是維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紐帶，也是解決生死大事的科學途徑。

五、學派不採取其它派別或教派的一些通用理論與方法，但也不強烈反對其它派別或教派，主張揚長避短，作為參考。

六、學派「養天下」的主張，是講究「理財」，引導群衆，通過自己的生產活動以致富，而非依靠他人來養活自己。還主張相互支持，「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不像其它一些教派，幻想「點鐵成金」。鐵是不可能點成金的，就是把所有的鐵都點成了黃金，也是沒有用的。學派非常重視《周易·繫辭》中的一

句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立身行事，有權力的人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無權力的人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

總而言之，太谷學派這一套所謂『內聖外王』的思想方法，雖然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不能說全無缺點，但批判地總結，尚有精華可承繼。編印《太谷學派遺書》，目的應在於此。我想的未必對，更未必全對，因此還請高明批評指正。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於

福建師大陽光新村

附記

右爲先師生前的最後一篇文章，也是數十年來一直想寫而無機會寫的一篇文章。先師在滿懷喜悅又感慨萬千的心情下寫完這一序言的初稿後僅十日，突發腦溢血，溘然安睡在書桌前。經多方搶救，醫治無效，未囑一言，與世長辭。嗚呼，悲哉！

先師劉蕙孫（一九〇九年七月一日——一九九六年三月廿日），譜名厚滋，曾字佩韋。江蘇鎮江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拜從著名的金石學專家馬衡教授。畢業後，在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領導下的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抗戰爆發後，先後在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輔仁大學史學系、燕京大學國文系、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任講師、副教授。建國後，歷任福建師範學院史地系、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先師宗緣碩學，受業名師，博聞強記，學貫古今。由於其祖父及父親均爲太谷學派的主要傳人，故對太谷之學的研究，既有家傳，更有創獲。爲了搜集、保存和刊印學派遺書，費盡心血。當得知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擬全部編印《太谷學派遺書》時，不禁喜形於色。年初，我陪同王明發主任拜訪先師時，先師當仁不讓，允以顧問身份，指導編輯，撰寫

序言。并表示無條件提供數十年來所珍藏的遺書資料，還代懇盛老和嚴老同為顧問。後又準備親自撰寫部分遺書的提要，以向世人解釋有關太谷學派神秘性的由來及實質。豈意賛志而歿，終成憾事。今只得由我承繼遺願，在先師《太谷學派的遺書》及《太谷學派遺書補篇》等大作的基礎上，佛頭着糞，將平日耳濡目染之所得，撰成評介性的文章。倘若所述尚能達意或稍可參考，實亦先師十年教誨之功也。

先師雖未正式拜從過太谷學派，但一生之行事，無不以其思想為圭臬。先師常語：自古人生最大的苦惱，就是消逝的悲哀。孔子總是聖人了，而《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為解決生死大事，佛出四門，提倡「涅槃」；道士修煉，力求「長生」。而太谷學派則承繼儒家「內聖外王」之學，將解決身心性命的功行，寓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宣揚「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具體的修身辦法，則是以「立功立言立德」為法門，以「希賢希聖希天」為主旨，最終達到「祈天永命」的目的。這是一種借助他人思想懷念作為人類性命永存的形式。換句話說，人生在世就要為社會為民衆做些有益的事情，使群衆念念不忘。當其命盡之後，由於群衆的懷念和景仰，即能使久存於宇宙的獨特性凝聚而堅固。也就是所謂：活在人民的心中了。縱觀先師的一生，從教近六十年，桃李滿園，造就甚衆。即使在「文革」年代，身處逆境，依然「有教無類」、「誨人不倦」，以培養有志青年為己任。在教學的同時，筆耕不輟，著述宏富，遍涉考古、金石、歷史、